

孔子和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刘巧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部，北京，100088）

摘要：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但孔子是有传统可以“损益”的；而苏格拉底则没有象孔子那样面对强大的传统，他依靠了人的思维。这样，尽管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道德上，而且也都毕生从事这道德教育，然而，两个人的道德教育观确实不同的。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道德教育；特征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是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然而，他们又是那么的不同！如果说孔子更代表仁者形象，那么苏格拉底就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智者。

一、“情”与“理”

“仁”在孔子道德教育内容中具有本体的意义，也是孔子认为是君子所要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仁者，人也，爱人也。“仁”的出发点建立在人的真实情感之上的，所谓“情理”，理在情之中。

“孝”是孔子强调的一个重要德目，其基点也是人的真情。

苏格拉底也讲到了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但是，“孝”不是他思考的重点，没有“孝”，他的思想体系依然是完整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们对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道德关系论述放在一起考察。有意思的是，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评论过儿子控告父亲的事件。在《游叙佛伦》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控告父亲杀人的游叙佛伦的态度，他平心静气的和游叙佛伦讨论着虔敬的问题。苏格拉底相信游叙佛伦敢告自己的父亲，一定是对敬神有着正确的知识，他说：

“请告诉我你方才自命有真知灼见的事。你说敬神与慢神的性质如何，无论就杀人一端或其他的事而论？是否就所有的事说，虔敬之为虔敬皆同？”“请你告诉我，你说虔敬是甚么，褻慢是什么。”

游叙佛伦回答道：

“我说虔敬就是做我方才所做的事；凡有罪，或杀人，或盗窃神器，或做其他坏事，不论是父母或任何人，都要告发，否则便是褻慢。”

在《论语·子路》中也记载了孔子对于子告父的态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苏格拉底对于游叙佛伦，是想让他说清楚控告父亲的根据，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兴趣点也是在“虔敬”本身。苏格拉底宣扬知识即美德，是比亲属伦常关系更为重要的，他启迪青年立身处世要独立思考合乎理智，这就动摇了当时雅典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传统伦常。他没有对控告父亲的儿子斥责。他指出：美德即是知识，知识包含一切的善。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使道德成为科学的对象，奠定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

孔子则直接就表示了反对，认为父子之间是应该相互袒护的，并表达了对儿子指证父亲的谴责。孔子认为父子之间的“亲情”，是高于社会公德的，道德的判断标准，是在于“情”。而苏格拉底则认为，判断的标准在于“理”。如果游叙佛伦能够论证控告父亲是合理的，那么，他就是有道德的，是虔敬的，“虔敬”高于“孝”，也就是说，社会公德高于父子亲情，高于“私德”。

有一点也需要注意：游叙佛伦控告父亲的罪名是：父亲害死了人命！而叶公乡党的那个“直躬者”，只是证明了：父亲偷了羊。

另一个例子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子弟不孝的处理。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既没，新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阳货》）

宰我说不必守三年孝时，孔子一定是很气愤的，要不然也不会在宰我出去之后，骂他“不仁”（骂“不仁”，而不骂“不孝”，可以看出孔子生气的程度）。孔子的论证根据，是用“情感”本身来论述的。三年之丧的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作为儿女，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守孝三年，表达的是对父母的感念哀思之情。这“情”是人人都有体验的，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理性思维的。这样做，便心安，不这样做，就于心不安，内心的“安”与“不安”，似乎是孔子道德行为判断的标准。所以，在宰予回答“安”的时候，孔子说，“女安，则为之！”。

“安”与“不安”，应该说是很个人化的范畴，最终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对于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可以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和回答。就如三年孔之丧，在孔子来讲，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只有为父母守丧三年，内心才会平静些；而宰予完全可以另外的感受。这样的道德教育精神就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

然而，在孔子的思想里，又不是这样的。“安”与“不安”不是个人说了算的，是有着标准的。这标准就是普遍的人情天理，现实的表现就是“礼”。所以，孔子听到宰予说“安”后，非常气愤，说君子是不会安的，也不为，“今女安，则为之！”在宰予出去之后就骂他“不

仁”！注重个人的情感，用“安”“不安”来说明问题，这和古希腊的智者派有相似之处。然而，把很个人化的“情”抽象为普遍的天理，并用礼来规范，这和苏格拉底的“理”在精神上又是相似的。

苏格拉底在儿子和母亲吵架的时候，劝儿子要对母亲“孝顺”时，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应当的关系。他把“应该不应该”“应该怎样”的讨论，诉诸自己的理性，是不是合理。而究竟怎样才算合理的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并没有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对话总是没有结果的原因。苏格拉底基本上是把合理的和有益的等同起来，认为人的理智、知识、智慧指导的美德，是有益的、高贵的，无益的就不是美德，从而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开创了功利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参见《回忆录》第二卷2章1-14节）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试图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规范找到终极的根据和基本原则。然而，他们最终找到的是这样不同：孔子是把人的真实情感作为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理由根据和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评价标准。事情该不该做，对不对，就在于自己是不是“心安理得”“合情合理”。而苏格拉底则是把“理”作为了这一切的标准和根据。

二、“行”与“思”

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实践体系，“仁”“孝”“礼”本身都是实践性的，都是在实践中获得实际意义的。孔子在讲这些范畴的时候，也都是本着“躬行”的意思的。“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孝是“孝道”，而“仁”最重要的就是“行仁”。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子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里仁》）

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颜渊》）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孔子并不是一定要贬低“言”，而是为了让弟子更加明确“行”的重要性，所以常把“言”“行”放在一起讲，以“言”来显“行”。孔子本人是躬行君子，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他的弟子也深受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

《对话录》和《论语》虽同是道德对话体，然而我们都可以看出它们在对话的内容、形式上都有很明显的差别。《论语》中关于道德的话语，在形式上几乎都是孔子的道德训诫，很少有真正的讨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问答体”。而《对话录》中的道德对话，在形式上，则是思辨的、讨论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在话语形式上，苏格拉底是诉诸话语的，而孔子则实质上取消了话语本身。从内容上讲，孔子是论断式的，是对“应该”的论断，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理由就是：“人情天理”是真实的，就是这样的，人们就应该以此为行动的根据。而苏格拉底在“自知其无知”的前提下，和对方讨论究竟该如何，为什么要如此。

苏格拉底讨论美德时，兴趣不在生活中人们究竟要怎样做，而在于怎样“思”。他不是

讲一个具体的人，怎样做才是勇敢的、虔敬的、节制的、正义的，而是要寻求“勇敢”本身、“虔敬”本身、“正义”本身。在《克拉底鲁篇》里，他说“我们要阐明的名词是指事物的本性。名字按其本性而带有真理性”。在《欧绪德谟篇》，他说：“我确实感到困惑，我想只能说：他们和‘美自身’是不同的，可是他们每一个中都伴有某些美”。苏格拉底确实发现了人的思维的潜力，而这种发现，一定让他兴奋。他声言“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的思维是最可靠的。他运用思维进行道德探索的时候，对道德思维的兴趣，超过了道德的本身。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认为“美德即知识”，甚至认为“没有人自觉为恶”，“恶就是无知”。（《小希匹亚篇》）

三、“直观体味”和“概念推理”

孔子的思维背景，是以经验的话语方式、直观的思维方式为特征的。正像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讲的：中华先人，习惯的是形象思维。中华先人对自然的看法是“天人合一”，这是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正是中华文化较好的融合了佛教文化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内在的体悟要多于外部语言，人们用心去体味着事情的对与错，而不依靠语言判断对与错。因此，孔子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恢复人们的道德。孔子关注了道德生活，但更关注道德生活的实践。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同于孔子，除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形式外，还在于它的前辈们的思想、思维方式带给它的影响。米利都学派一开始就是在追寻着万事万物的本原，就一直在望着万物的背后，希冀洞察万事万物，最终找出世界的本原，而他们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阿那可西美尼认为是气，德莫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最值得注意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活火”，“这个万物同一的宇宙，不是某个神也不是某个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有分寸地燃烧，有分寸地熄灭”¹

这“有分寸”后来赫拉克利特发展为“逻各斯”（logos），也就是万事万物的规律。在变动不居、流变不已的世界里，存在着确定不移的本原，“一切是一”。这是古希腊哲学最初的、也是贯穿始终的一种思想。在万物中寻找不变的东西，寻找事物背后的普通性，这样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对苏格拉底产生影响。而智者派主要从事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对于苏格拉底的思考内容有重要的影响。智者派，应着雅典繁荣时刻而生，在道德观上，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个体。这是适应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曾对于那个时代的雅典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们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了起来，他们的著名的命题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怀疑一切，包括神。他们要求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决定道德，而这标准就是自我，他们是收费授徒的教师，教授演讲术、修辞学、辩证法。由于话语的需要，他们有人专门进行了逻辑研究。

如何在概念中表达，这就是理论思维的问题。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传统和时代中出现的。这种思维的背景，和孔子的截然不同。在这种思维的背景，苏格拉底尽力追寻着不变的东西。对于道德，他诉诸思维和理性，用不变的“知识”、“理念”来替代随个人的感觉而变动不居的道德观。这具体表现为苏格拉底一直在追寻着普遍的定义，如“美本身”、“虔

敬本身”、“善本身”。

四、文化传统与诉诸理性

中国和古希腊尽管说都是文明古国，但是，历史文化传统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中国有比古希腊更久远的文化传统。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前的西安半坡文化时代，汉字就已经形成，²至少早于孔子 2000 多年。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典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商周都有史官，在春秋时代各国也有史官。周公制礼作乐更是形成了丰富的周文化。周代，实际上就是礼乐等级下的道德社会“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³这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典籍，一种有利的资源，同时又是一种历史负担，“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⁴，孔子就是在这样的礼乐文化中成长的；长大后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在“天下无道也久矣”的时候，孔子想要通过道德重建来拯救社会，就自然借鉴了周的礼乐。所以，孔子就推崇“仁”，并用了“孝”和“礼”来实践；进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育。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整体上，特别是和苏格拉底比较而言，就表现为以血缘情理为基础，以“仁”为核心，以“孝”和“礼”为实践的实践道德思想体系。

希腊在公元前 700 年左右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创建了希腊字母，进入文字时代。《荷马史诗》最终形成于 6 世纪，比苏格拉底早了 100 多年。就文化传统讲，相对于孔子所处的中国，可以说苏格拉底生活的古希腊并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威。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荷马史诗》对希腊的道德生活的影响最大。“它突出歌颂了希腊民族的骁勇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奥德赛是当时希腊人民心目中最崇敬的英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希腊人所认为最高尚、的品德，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或者换句话说，希腊的思想家们在以后所说的四大主德，都是从奥德赛等英雄人物身上概括出来的。”⁵这是希腊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下，他依靠自己的理性来进行道德教育。他习惯于整日整夜地站着思考⁶，以至于常常能够听到“灵异的声音”，他认为这是神的指示，（现在，我们则更倾向于认为，那时他一直思考的结果）。认为自己是神派给雅典的一只马虻，让他来刺激雅典的。（《申辩篇》）他追求的秩序，既然是随着人们道德堕落的而消失的，那么，解决的途径也在道德建设。而苏格拉底要恢复秩序，却没有井然的“礼”。他诉诸思维和理性，用不变的“知识”、“理念”道德观来替代随个人的感觉而变动不居的道德观。这具体表现为苏格拉底一直在追寻着普遍的定义，如“美本身”、“虔敬本身”、“善本身”。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得出了“知识即美德”（美德即知识）的道德观。把知识、理性、智看作是绝对的，认为有了真的知识，就一定有美德。（这在柏拉图那里最终发展为“理念”、“相”成为独立的存在。）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就具有着明显的理论性的理性特征。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但孔子是有传统可以“损益”的；而苏格拉底则没有象孔子那样面对强大的传统，他依靠了人的思维。这样，尽管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道德上，而且也都毕生从事这道德教育，然而，两个人的道德教育观确实不同的。其实，在苏格拉地追求永恒的同时，孔子也在追求永恒，只不过苏格拉底所追求永恒，是一种几乎是分离了现实本身的东西，是在现实之上的；而孔子所追求永恒，恰恰是在现实中的，也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

五、道德理想的追求

他们都是他们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所处的社会，都是危机四伏、混乱无序，他们都预感到了大动荡、大变化。对于这样的变化，他们都归结到了人们的道德的变化。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三代¹，尤其是周代的以周天子为最高的统治者、以分封制为政治体制的比较完备的等级统治制度，这制度就是《周礼》。每个人几乎是在出生的时候，所应该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就已经是规定了的，社会会教人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每个人也都知道自己是那个等级的人，也都知道做什么，社会似乎是井然有序。在孔子的思想中，三代是最理想的社会，尤其是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治礼作乐的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最伟大的政治家，而现在“吾不复梦见周公”。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秩序井然的那个周礼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诸侯不再尊敬周天子，而大夫也不再尊敬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家臣出。孔子认为这样的时代是因为人们的道德败坏，特别是上层人士的道德败坏。根源在于人们没有道德，特别是诸侯、大夫等统治阶层：父子相争，君臣相越。而“士”也是已经没有了古代的那种道德修养，“古者学者为己，今者学者为人”，“圣人，吾不得见也，能见君子者，足矣”。孔子认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人们的道德已经普遍堕落，人心不古，社会也由此日益动乱。孔子一心想恢复那个秩序井然的时代，颠簸一生，周游列国，“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苟有用我者，为东周乎？”为东周，也就是按照周礼，再加上一个“仁”，来建立一个人人都修己知礼的社会。

孔子没有经历过他梦想着的西周，而苏格拉底则经历了雅典的兴盛与迅速衰落。雅典的兴盛时期，整个雅典就像一座雄伟辉煌的大厦，是那么令人的惊喜！当时的人写道：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一个笨蛋；假如你见了雅典而不狂喜，你就是一只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就是一头骆驼⁷。空前绝后的民主制度、雄厚的经济基础、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使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学校。就是在今天，欧洲人回忆那个时代，仍然有一种激动的心态。

而雅典的衰落是那样的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就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雅典的制度、教育、人们的时候，雅典正一步步走向衰败。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的大瘟疫，使雅典迅速地走向了衰落。公元前429年，雅典发生瘟疫。瘟疫对雅典人的道德生活的影响似乎并不比战争小。几乎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情景。“因为这个灾难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致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宗教和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以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和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⁸这是一种最具有破坏性、冲击力的天灾，人们眼睁睁的看着身边的人大群大群的、一家家的死亡，看着有德行的人并不比无德行的人长寿，感受着人生的无常，面临着自己随时都可能

从这世界上消失的危险，所有的人的和神的约束力都崩溃了。还有什么能比随时都会面临生命的消失更危险的事情么？单是看到熟悉的人、亲人的消失就够了，就可以使人对着世界、对人生产生虚无飘渺的感觉，都会对人生进行怀疑，而更何况是自己也面临着生命的随时消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摧毁人的信心、信念的呢？人们还有必要遵守道德吗？同时，极端民主之下，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是非判断，法庭、会场成了蛊惑家们的演说场，普通的公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的是非标准，人们践踏法律，也践踏人间的其他的一切东西。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道德的反思的，认为只有进行道德教育，寻求道德的永恒价值、寻求道德中永恒不变的“相”“善”，让人们知善、守善、行善，才能够拯救雅典。

可以说孔子和苏格拉底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最根本的是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认识。他们都把现实社会的弊病归于人们道德的堕落，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进行道德教育来拯救社会。可以说，对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是他们从事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他们毕生从事道德教育的精神支柱。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us' and Socrate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Liu Qiaoli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heory,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Confucius and Socrates are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founders i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y had some similar thoughts, however, their moral thoughts was very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ir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make clear comparison. If Confucius kept "ren" (kindness) as the core and "xiao"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the base of his moral system of educational ideology, Socrates studied and practiced moral theory with "knowledge" and "virtue" as its center.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feeling" and "action" and Socrates' by "reason" and "goodness". Their different thoughts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keywords: Confucius, Socrates, moral education , characteristic

收稿日期: 2003-11-10

作者简介: 刘巧利，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理论研究部。

¹ 《残篇 30》，参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 37—38 页

²孙培青 任钟印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 第 41—43 页

³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⁴《史记选注》齐鲁书社 1998 年版，第 171 页

⁵罗国杰 宋希仁 编著《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第 27 页

⁶《会饮篇》THE DIALOGUES OF PLATO ,PP544---545; 参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

⁷参见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74 页

⁸【古希腊】修昔底德 著 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第 141 页